

湖南體育史料

第4輯

HUNANTIYUSHILIAO

湖 南 体 育 史 料

(第 四 辑)

主 办 湖南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编 辑 湖南省体育文史办公室
地 址 长 沙 市 体 育 馆 1 号

1 9 8 4 年12月20日印刷

(内部刊物)

目 录

人物介绍

黄兴是湖南早期体育活动的开拓者.....苏鑫泉 (1)

刚正无私的实干家

——记体育教育家陈奎生教授.....湖南省体育文史办公室 (2)

湖南最早的女体育教师——范慕英女士.....马毅君 李淑媛 (6)

追忆父亲李惠迪.....李于什 李于仕 (7)

回忆夏义可先生.....陈翊荣 陈治策 (9)

老而弥坚的体坛耆宿

——记袁浚教授六十年体育生涯中的片断.....朱茂松 (11)

秋瑾女侠在湘习武.....万天石 (13)

体坛群英

湖南省体坛名家的成就.....李锡刚 (17)

回 忆 与 旧

对我省体育科研的回顾.....廉挺涛 (33)

我省早期的体操运动.....皮 灿 (16)

怀念湖南体操队.....袁洪幸 (39)

湖南体育发展二三事.....唐力修 (43)

武术史话

三十年代湖南的武术组织及活动.....万天石 (45)

新化武术源流初探.....晏晓榕 (48)

教会与体育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概貌.....唐力修 (50)

体育师资

抗战前湖南体育师资培养简况.....易挂森 (56)

体育用品

湖南球业生产的初创

——记陈家恒先生创建强华球厂.....陈志明 (60)

史志通讯

中国体育史学会成立.....省体育文史办 (62)

全国体育史学会学术活动预告..... (32)

依年记事

湖南体育运动记事 (1960——1965)饶锦书 (64)

黄兴是湖南早期体育活动的开拓者

苏鑫泉

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黄兴先生（1872—1916），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而且还是我省早期体育活动的开拓者。

先生自幼喜爱爬山、游泳、钓鱼等活动。年满十四岁（1888年）时，在家自修诗书，课余从浏阳李永球学习巫家拳，只手能举百钧；常邀集乡村儿童到屋后纹银坪练习拳术，相互比舞竞技。在家自学多年后，于一八九三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学业成绩突飞猛进，文思敏捷，常受到全院师生的好评。这时书院尚未设置体育课，每当课余，他常以散步、习拳健身，因此身躯一贯结实。一八九八年，由“城南书院”调选“湘水校经堂”学习，复调“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在此期间，先生笃志向学，长于文艺，尤工书法，且爱好地理和体操，对体操一科尤为精勤。每临操练，如临敌阵，常短衣布鞋，抖擞精神，唯命唯谨，认真操作，不稍虚苟，动作无不合度。

一九〇二年春夏之交，先生被选派赴日留学。抵东京后，遂入“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因蓄志反清革命，故十分留意军事技能之学。课余，听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暇时则参观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每射必中，弹无虚发，获得奖牌不少。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湖南编译社》，所译日本教育家所著的《学校行政法论》一文，较早宣传军国民教育思想。一九〇三年，曾在宏文学院领导湘籍学生组织“土曜会”，鼓励同学挺身杀敌，破坏现状，并谓“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当时为了声讨沙俄侵华罪行，曾组织拒俄义勇军，后改名“学生军”，继续操练军事兵操，朝夕苦练，风雨无阻。后

因日本政府勒令解散“学生军”，于是遂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是年六月回国抵上海时，适遇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相约回湘后到明德学堂任教。

一九〇三年八月至一九〇四年十月，先生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先教地理，后教体操；其他教员缺课时，文科方面的课程，一般都是由他代理。那时我省的体育教学尚处于初创阶段，人们对体育教学的认识模糊，守旧者甚至视体育为异端。先生常以“尚武爱国”精神鼓励学生努力上进，且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强身首在加强体育锻炼。学生受其革命思想的熏陶，体育技能和爱国思想提高很快。先生还联络校内外革命积极分子组成“扬子江野球（棒球）队”，作为革命团体的外围，经常是上午在省教育会前坪练球，下午就在教育会内开会，藉以掩人耳目。扬子江野球队的组织与活动，不仅对武昌起义和光复湖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明德学堂的体育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先生除任教明德学堂外，还兼任湖南实业学堂预科教员和安徽旅湘中学教员，以及国立第一女学的体操教员。当时体操课的内容，主要有兵操、器械体操、柔软体操、哑铃等。他教学生很耐烦，常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务使学生热爱体育课，自觉自愿的参加体育锻炼，并无疾言厉色，因此学生都很尊敬他。

一九〇四年秋，先生辞去明德学堂等校的教学任务，专心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为推翻清王朝和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而奔波劳顿，出生入死，真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刚正无私的实干家

——记体育教育家陈奎生教授

湖南省体育文史办公室

陈奎生字槐三，一八九〇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于长沙市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全家兄弟姐妹八人，父亲擅长镌刻，因家无恒产，全仗父亲镌刻印章、木板书、青石碑文谋生。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在母亲的支撑下，以大哥教小学和两姊作女红的工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他七岁启蒙入私塾，一九〇八年高小毕业后，考入公费的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前身），在校肄业五年，敦品励学，一九一三年毕业后留校任附小教员、主事之职。一九一八年秋，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体育科深造，一九二一年夏毕业后，历任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北平等地的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校长和大学教授等职。陈奎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体育事业，孜孜矻矻，数十年如一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体育家。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在长沙市逝世，享有九十三岁的高龄。

青年时代的陈奎生愤世嫉俗，憎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民族的危急存亡，深怀不

安。在中路师范历史教师刘劲（同盟会员）的引导下，于武昌起义前夕，加入了湖南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团体，多次到城隍庙（即今长沙市第一医院）和北门西园龙宅花园等地，参加秘密集会，策划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南起义胜利，他当上了学生军，接受军事训练三个月。后因南北和谈，停止北伐，学生军被解散，便仍回校继续求学。

陈奎生在中路师范读书和留校任附小教员和主事时，对老师杨昌济、实习主任徐特立等人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仰；同时和同学毛泽东、何叔衡、柳直荀、肖三等人，过从甚密。受到了良师益友们的熏陶，后来虽未直接投身革命斗争，但在每个革命运动的关键时刻，总是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为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时，南京学界奋起响应，他当时是南京高师的学生，领着同学走出校门，接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向南京

的民众和军队进行宣传,向军阀政府请愿,鼓动工商学军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罢操,以示抗议。是年暑假,他由宁回湘度假,与原一师学友何叔衡一起寄寓在楚怡小学,经何介绍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组织的“新民学会”,并多次参加该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应毛泽东同志的邀请,常为《湘江评论》周刊撰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在长沙发动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他虽身在南京,却为湖南的驱张运动,做了不少的宣传、通讯工作。一九二六年,湖南城乡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柳直荀是当时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柳的直接领导下,为当时的农民运动撰写文稿,下乡调查,并在校内外广泛进行宣传鼓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夜,湖南突然发生反革命武装政变,使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功败垂成。“马日事变”后,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每日屠杀工、农、学生等革命群众数十人之多,他被迫离湘去浙江宁波四中任教员。一九二九年去武昌,任湖北体育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一九三〇年八月回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实习主任。

一九三六年秋,因一师校长不谙师范教育规律,办学不力,受到教育部督学的严厉批判。陈奎生前后在一师教学多年,品德高洁,学有专长,深孚众望,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拥戴,他无法推却,只得勉为其难,便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一师校长。任职后,很想改变一下湖南各地小学体育、音乐教师既缺且滥的现状,便在当年秋季招收音体班学生一班,是为湖南公立中等师范学校设置音体班的嚆矢。后终因生性耿介,办学主张与教育当局两相矛盾,仅任职十月,奋然辞去。先日卸下校长职务,翌日仍接任实习主任。这种能上能下,不计个人得失的心胸,至今尤为人称颂。

一九三七年冬,徐特立同志由延安回到长沙,创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开展抗日救亡

工作。那时,湖南反动当局,对徐老的活动处处设置障碍,横加限制。陈奎生为使徐老回湖南的工作,尽快打开局面,他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以一师校长名义,为徐老组织讲演会,一次在长沙银官(即今新华)电影院,一次在第一师范礼堂。徐老身着八路军军装,神采奕奕,口讲指划,滔滔不绝,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全民抗日的重大意义,指示革命青年的奋斗方向。听众全身贯注,鸦雀无声,深为感动。抗战期间,反动当局迫害革命青年。每遇一师进步学生被捕时,他总是正气凛然,四出奔走,设法营救。

一九四〇年二月,湖南教育厅派陈奎生任省督学兼体育视导,又一次强人之难。他任职不到一年,仅去常宁县视察了广益和船山两所中学,赴重庆出席了一次当时教育部召开的国民体育会议。因不屑与官僚政客们周旋,挂冠而去。他常说自己是醴陵的磁器,一摔就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五四运动”后,陈奎生深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把强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教育 and 体育上。从那时起,就坚定了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每讲授一门课程,从讲稿的编写,课前的准备,课堂的讲授,一直到检查学生笔记,批阅作业,回答学生的质疑问难等各个环节,一丝不苟的精神贯穿始终。而且对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很有研究,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凡经他面授过的课目,给学生留下极其深刻的记忆。因此,受到学生的普遍敬仰。他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信赖学生,特别喜爱儿童。为了研究小学教育与儿童心理学,曾放弃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不当,去担任小学教师。他给儿童讲课,讲故事时,绘声绘色,生动形象,最受儿童的欢迎。儿童们亲切地叫他“陈爷爷”;而他自称老儿童。把自己炽热真挚的感情倾注在儿童身上。

他一贯主张当教师的要坚持既教书又教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态度和蔼，谦虚谨慎，衣冠整洁，举止文明。他不烟不酒，一生绝无不良嗜好，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惜时如金，守时守信。既严格要求学生，更严格要求自己。旧中国社会风气败坏，学生队伍中自暴自弃，只图混张文凭的有之，染上社会劣习的也不乏其人。不少学生在他的言教身传、潜移默化中获得教益。

陈奎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对学术的研究锲而不舍。体育术科以游泳、单杆见长；学科涉猎较广，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造诣较深，尤其对小学体育有独创的见解。为了学术研究，他参加了旧中国的许多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一九二三年加入陶行知倡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连续三年暑假，先后赴北平清华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太原山西大学，参加该社举办的第二至四届年会。每次年会，他都参与体育组和小学教育组的研究讨论。一九二三年加入了陈鹤琴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儿童心理学会”。此外，还加入了“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体育学会”，“中国教育心理测验学会”等等。在教学之余，以惊人的毅力，潜心著述。一生著有《小学体育之理论与方法》、《中国小学体育教材教法》、《小学器械运动》、《实用按摩术与改正体操》、《运动教育心理》、《湖南体育史略》等。这些著述，大都由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勤奋书局刊印发行。他还经常撰写体育、教育方面的专论、通讯等稿件，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刊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长沙《体育周报》创刊，是湖南最早的体育刊物，发行全国各省。他是该刊的撰稿人和驻南京的发行人。南京高师毕业后，他直接从事过多种体育刊物的主编工作。如商务书馆出版的《体育研究》、长沙出版的《体育周刊》等。

陈奎生深感旧中国的体育基础薄弱，运动技术落后。他竭力倡导体育运动从学校走

向社会，积极主张广泛开展各级运动竞赛活动，藉以增设运动场地，扩大影响。全国运动会的召开，他是湖南体育代表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并且多次应聘为全运会的总记录。总记录是负责把各个项目、各个组别的纪录汇总，工作纷繁复杂，不能有半点纰漏。旧中国的运动会争争吵吵的现象甚普遍，也常因总记录出了差错而引起。陈奎生为人正直无私，工作细致认真，每次任全运会的总记录，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为广大体育界人士所折服。华中运动会由湘鄂赣皖四省组成，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在有关各省的省城轮流举办运动会共六届。他是该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大会各种规章制度的厘订，各项运动竞赛细则的补充规定，大都由他起草。每届大会期间，他担负着繁重的任务，是华中体育会的台柱子。湖南全省运动会自清末至民国共举行过十七届，从一九二三年的第六届省运会起，他就成为省运会的主要筹备者和业务骨干力量。一九二四年第七届省运会结束后，他与黄醒等人，倡议省运会应在全省各地轮流举行，为此，在报刊上发表专论进行鼓吹，果然获得教育当局的赞同。故第八届省运会在衡州举行，第九届省运会在常德举行，打破了历来只在长沙举行的旧例。民国时代湖南体育界有新旧两派的派别斗争，不同属一派的人就格格不入，互相戒备，面和心不和，稍有争议就闹得乌烟瘴气，甚至拳足相加。陈奎生不务虚名，不图私利，不为任何一派所左右，两派发生争吵时，只有他出面仗义执言，两派矛盾才得以缓和。

陈奎生一生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从不讲究吃穿，布衣淡饭，饱暖为乐。居室中窗明几净，齐齐整整，凡事一概自己动手。旧社会长沙无公共汽车，多以黄包车代步，他不管是三伏炎热还是数九严寒，从不乘坐。抗战期间，长沙市各学校均西迁边远小镇，铁路、公路交通破坏，他有事外出，不论途

程远近，总是步行，从不坐轿。节约用品更是他一贯的美德，讲义的初稿用废纸草写，粉笔要写到蚕豆大小方止，废信封一律翻过来重用。他的生活虽然如此节俭，但对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却慷慨解囊，热忱相助。有的学生因家庭经济遭到突然变化，生活上有困难，他主动给予帮助；有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他长期资助。这些学生学成就业后，怀着感激的心情，多次给他寄钱寄物，都被他一一退回了。他说：“我尽我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我认为必须帮助的人，我想到的是培养有用人才，决没有想到人家的报效。”早在一九三四年《勤奋体育月报》的二卷九期，在介绍我国体育家与运动家的专栏里，给陈奎生的评介是：“性朴实，恶虚华，平生绝无嗜好，居常以‘俭以养廉惜物，勤能补拙习劳’自励。任职尽责，不苟且敷衍，亦不阿谀取巧。……”道出了他为本人的本色。

一九四二年春至一九四九年冬，陈奎生在前国立师范学院体育系、科任教授兼科主任。经过他的辛勤耕耘，为提高体育系科的教学质量作出了贡献，为树立优良的学风作出了榜样。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体育人才，其中许多人至今仍是我国体育界的中坚力量。一九四九年暑假，正值湖南解放的前夕，他由南岳（当时国师所在地）回长沙度假，看到程潜、陈明仁发布的“和平解放湖南的宣言”，他眉开眼笑，为湖南免遭战争之苦而高兴！当即设法秘密去信尚待解放的国师留院友人涂文等，劝他们坚持留守南岳莫动，组织力量护校，准备迎接解放。使得国师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流散，学院的财产设备得以保全。一九五〇年原国师与湖大合并，他任湖大体育教授并代理体育系主任。一九五〇年八月奉调去湖北教育学院，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湖北省委委员。一九五二年调华中师范学院。一九五五年调武汉体育学院。一九五八年由武汉体院退休回长沙定居，曾任第五届湖南

省政协委员。

建国后，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工作越发起劲。在长沙时被选为文教界代表，三次出席长沙市各界代表会议。在武汉时参加民盟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以“国昌、家庆、人寿、年丰”为题，发表文章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主席电邀他去北京中南海作客，老友久别重逢，毛主席见面就问：“你的生活还象从前那样有规律吗？”惜别二十多年，对他那种严格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性，犹未忘却。足见给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十年动乱期间，他已是耄耋之年，深居简出，每天仍坚持读书、看报、写字。毛主席概括徐特立同志的养生法为：“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他将这四句话反复书写，说是在写中加深领会，藉以表示尊敬徐老师和拥护毛主席的心意。后来挑了一幅，用镜框嵌好，挂在卧室的写字台正上方，成了他老年养生的座右铭。晚年重听，行走不便，亲友学生来探望他时只能作笔谈。他感叹地对来访者写道：“我老了，不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事，寿最高也没用”。与人交谈中总还是念念不忘祖国的教育事业。一九八〇年他九十寿诞时，自知身体不行了，亲笔写下遗言：“我死后，遗体送火葬场焚化……骨灰作肥农田菜地之用，亦是化无用为有用。”他女儿陈一中遵循他的遗训，未保留骨灰，丧事也办得简便；并将他一生的积蓄七千元，捐给一师附小作奖学基金，五百元捐给长沙市北区民主东街办事处四居委会幼儿园，购置儿童玩具。这是老教育家关怀祖国教育事业的最后一点心意。

陈奎生热爱教育事业矢志不移。他律己严明。待人宽厚；刚正不阿，急公好义；学而不厌，深藏若虚；诲人不倦，师德可钦；桃李遍大江南北，教泽满七泽三湘；在平凡的工作中，对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极不平凡的贡献。

（丁非杰执笔）

湖南最早的女体育教师

——范慕英女士

马毅君 李淑媛

范慕英女士，籍贯上海。一九零八年毕业于上海女子师范学堂体音专修班，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一九零九年，周南女校创始人朱剑凡先生，为了充实办学经验，到江苏考查取经，在上海女子师范学堂当事人的介绍下，于一九一零年将范慕英女士聘请来湖南周南女校任音体教员。她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在湖南担任体育教学的第一个女教师。在她的教学内容中有舞蹈、游戏、徒手操、轻器械操等。一九一二年周南女校第八周年校庆运动会上担任组织领导工作，指挥井井有条，节目扣人心弦，观众纷沓而来，盛况空前，长沙市为之轰动，宣传影响是很大的。这届运动会，表演和比赛项目共二十八个。有哑铃、球杆、轻气球、大连环、三人木环、铃杆、混合体操、盆球、六人舞、双蝶、蜻蜓、寒英、月园时、黄鹂第一声、圮上进履、月涌波心等。当时《天民报》和《长沙日报》均有报导。

天民报原文节录：“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南女校盛开运动会，……有双蝶蜻蜓对舞，徒手哑铃各式。其指挥也，则有慕英等诸媛；其会合也，分上下午，为次数十；其转动也，分高师小班，为人数百。宾之至也，别乎男女；客之座也，辨其东西；于是观者

盈千，共为赞善。扬袂如云，拍掌若雷。当其合场递进，按次而俟，慕英之导引有方，诸生之疾徐中则……。”

长沙日报原文节录：“……其技术之娴熟，精神之活泼，秩序之整齐，气象之和婉，观众叹未曾有，而圮上进履一节，尤寓精意。其法以初小生为之，择其年稚者二人，着黄色衣冠，挂白须，曲背各坐一处。余分为两组各环老人立，翁故脱履坠地，两组以次各环一周为翁进履，既纳翁又脱之，以先完之组为胜，胜者得旗。上题曰：‘孺子可教’。此为最新之游戏法，极为有趣。其余有舞蹈游戏、有徒手体操、有器械体操。其佳妙难以尽述。”

范慕英女士热心教育，业务娴熟，在游戏中贯串有历史故事内容，如运动会中“圮上进履”一节，是描述汉高祖时名人张良，在幼年时虚心向圮上老人求教，虽受到老人的留难，仍有坚持不懈的决心。游戏内容能鼓励学生虚心求学，要求向上，不怕困难，对青少年品德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这说明了范女士深知教育的精奥，在体育教学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她在周南女校教学时间虽不太长，但对湖南学校体育运动的倡导，在历史上起着不可泯灭的作用。

追忆父亲李惠迪

李于什

李于仕

我的父亲李惠迪（1893～1952），是六十年前长沙的一位体育教员。他终身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为增强人民体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作过很多贡献。可惜我们对他早年在长沙时，从事过许多有益于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况，知之不祥，无法详述。只能就我们的所知，追忆如下：

1893年11月12日，父亲出生在长沙县东乡跳马涧坳子塘，小时在家放过牛，以后到私塾读书。因祖父是个武秀才，他便随父习武。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不满，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忧心忡忡。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离乡进了长沙城，就读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前身）。由于他秉性刚直，生活俭朴，而且热心为大家办事，受到学校徐特立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爱戴；毕业后留校任附小体育教员。后来相继在修业小学、武昌旅鄂中学，中华大学等校任体育教师。毛泽东同志担任一师附小、修业小学、湘江中学的主事时，很重视体育工作，特聘请父亲在这些学校教体育课。针对当时德、智、体三育脱节，轻视体育，给学生带来各种不良影响，

毛泽东同志鼓励我父亲，从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学方法和经验，因材施教。我父亲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于1923年编写了《体育教材》、《游戏教材》等体育教学参考书，以解决当时各校缺乏体育教材的困难。这几本书出版后，受到省内外体育界的欢迎，连续印刷了三版，尚感供不应求。

“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湖南的群众运动，在毛泽东、郭亮、李维汉等革命同志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父亲是积极的参加者。这时，他除了继续担任学校的体育课外，还担任了长沙教职员联合会的执行主席和湖南体育会执行部主任。他以教职员会和体育界代表的身份，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各公法团体联合组织的各项活动，如焚毁日货，反日示威游行，组织外交后援会、雪耻会，响应全国总罢工，发动各校罢课，以及驱逐军阀张继尧、赵恒惕的斗争。在这些活动中，他先后担任游行部主任，交际部主任、委员、代表、联络负责人等各种职务。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干脆搬到省教育会住宿。当时长沙举行的各种群众大

会,大都在教育会坪召开,他几乎无会不到。在电讯广播设备尚未普及的二十年代,长沙集会时多用厚磅纸做成的土喇叭扩音。当时父亲经常出现在集会的主席台上,拿着土喇叭喊口令、指挥群众队伍,因为他嗓门大,声音宏亮,群众给他一个雅号叫“喇叭司令”。六十年前的老长沙人,几乎很少人不认识李惠迪这个大喉咙的“喇叭司令”。

李惠迪为开展湖南体育运动竭尽心力,苦干实干。他是湖南体育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责任人之一,也是华中运动会,华中体育联合会和全省运动会的积极组织者,他还协助拟订湖南公共体育场的建场计划,报请教育当局,将长沙协操坪开辟为湖南省公共体育场。他曾多次率领湖南体育代表团,出席华中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第二届华中运动会在长沙举行时,他担任编配部总干事的职务。他早在1917年,就与楚怡学校体育教员黄醒,发起组织了湖南体育研究会;支持与协助黄醒创办湖南最早的体育刊物《体育周报》,在全国发行,推动了湖南体育活动的开展。他公余之暇,还先后在《长沙大公报》等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体育方面的专论,主要有《湖南体育史略》,《十年来之湖南体育》等文章。现在看来,是一些珍贵的体育史料。

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当时父亲被国民党通缉,因而易名李宗由,逃到江西赣州。父亲到赣州后,起先任育英小学体育教师,后担任私立三一小学校长至1950年。他工作踏踏实实,刻苦耐劳,将一所只有几十个学生和缺乏经费来源的穷学校,发展成三百多名学生,为赣州地区教学质量较好并有一定影响的学校。不少学生毕业后,能考入重点中学继续学习,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

三一小学是靠收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开支,请不起校工,一切服务性的工作,概由父亲持操,如带头为学生烧开水,搞环境卫生

生等。他常引述“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号召大家经常参加体力劳动,以增进健康。他不讲究吃穿,粗衣淡饭,温饱为乐;他烟酒不沾,无任何不良嗜好;强调为人师表,必须身教重于言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教育学生。在他的教育和实际行动的带动下,我们兄弟从小就会洗衣、补衣、做饭、料理生活等,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

1940年父亲在赣州倡议创办江西赣县体育场,政府仅拨给一块场地,几十担大米作开办费。经过他的艰苦奋斗,硬是把体育场办起来了。并在体育场组织各种球类比赛活动,举办体育运动大会,推动了江西赣南地区体育活动的开展。父亲对体育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能任劳任怨,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旧社会运动场上不守纪律,任意侮辱殴打裁判员的事是家常便饭,父亲虽然多次挨过打,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

1942年6月12日深夜,父亲被江西赣县特务情报室以“共产党领袖”、“汉奸头目”的罪名逮捕入狱,手镣脚铐,关押半个多月,受尽了反动派的各种酷刑。后经当地教育界,宗教界、同乡会、街道居民联名保释,幸免一死。

1949年赣州解放后,父亲任江西赣州文化馆副馆长,仍兼体育场场长和三一小学校长至1952年去世止。由于他工作积极,被评为1950年文教系统劳动模范,出席了赣州市“英模大会”,并当选为赣州市第一至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过赣州市优抚委员会、地方财产清理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热心从事各项社会活动。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为体育事业奋斗终生,要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是他一生的愿望。可惜他未能亲眼见到今日中国体育的伟大成就,如果父亲能在九泉下有知,也一定万分高兴!我们后辈一定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工作,为人民的体育事业繁荣兴旺,作出自己的贡献。

回忆夏义可先生

陈翊荣 陈治策

夏义可先生，北欧挪威人，生于1888年4月2日，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过挪威国会议员，精建筑学，获工程师职称，兼长体育，田径、球类成绩都很好，尤其对游泳有高深的造诣，曾以挪威国手资格，出席欧洲田径、游泳的比赛，获得优胜，并曾三次游过英吉利海峡。

1912年由挪威教会派来我国传教，任长沙青年会体育干事。青年会系由教会领导和组织的青年团体，向中国青年宣传耶苏教义，从中吸收教徒。体育干事主要是开展体育活动，还负责夏令营、游艺会等多方面的活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设在四方塘，有健身房、游泳池、室内篮球排球场，弹子房，体操器械，室外有个大操场，可以进行篮、排、网球比赛。篮球排球场还有木质看台，体育设备齐全。先生任干事后，积极开展青年体育活动，兼任体育教师。当时湖南体育事业处于初创阶段，体育项目很少开展，自夏先生抵达长沙后积极进行推广，并多次倡办省运动会。

1930年，先生协理湘中信义会教育事业，1931年被派到益阳基督教信义会主持工作，同时担任信义中学校董，在校教授体育、英语、物理等课。他不带家属，不住当时华丽洋楼，而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内，虽系异帮人士，却能与学生打成一片。有次暑假他带领学生往安化天罩山过夏令营生活时，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同锻炼，以身作则，不畏艰难。在学校除担任正课外，还组织教师业余足球队、游泳队，率领师生在资江河里开展跳水、游泳等活动。他夏季乘轮船去桃江时，在船上的时间少，在水里随船游行的时间多。益阳体育界开展游泳活动，是从夏先生开始的。他也是教会中慈善事业的负责人之

一。1933年洞庭湖发生水灾时，他任湘北赈灾委员会委员，到灾区慰问灾民办理赈灾工作。

先生为人和蔼可亲，学生去访问时，他总是热情接待，学生请他照个相，有求必应，不收用费，他滑稽地说：“我的照相馆，是蚀本的无限公司”。据说他妻住在美国，在经济上经常接济他，他却资助了很多贫苦学生，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益阳县立龙洲师范校长周昂僧，对先生的才德很器重，聘先生兼任龙师体育教员。先生将所得薪金，全部捐给龙师作添置图书仪器的用费。先生因久住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常说：“我爱我的中国。”家居时，喜穿中国服装，说中国话，读中国书，写中国字。有一次，他参观龙师学生成绩展览会后，在留言簿上写道：“好也，好得很也”。旁观的人都大笑起来。

1934年5月29日（即农历4月17日），信义中学童子军赴长沙参加检阅，先生本应率领学生一同前往，但他考虑到当天下午龙洲师范有两节体育课，便决定让别的教师领着学生先走，他于30日赶到。是日下午2时，他照常用跑步至龙师，率领龙师六、八两班学生至龟台山下江畔的可石园上游泳课。学生都坐在石矶上，先生更衣下水，边游边讲，传授技术。讲完动作要领后，上岸坐在学生群中休息，在闲谈中曾说：“我早年游泳能潜水数百米。”学生请先生表演，先生便潜入水中，但不远即冒出水面，返回石上说：“老了，不行了”。稍休息后，学生鼓掌，请先生再试。先生再潜入水中，少顷没有动静，学生正在凝视中，忽然发现对河木筏附近，有一黑头露出水面，以为先生潜水渡过江了，大家都鼓掌欢呼。过了一会，

头不动，料为木头，知道已发生了意外事情，马上报告校长周昂僧先生，全校师生，奔到江边，一面寻找渔划和会游泳的人，悬重赏营救；一面通知桃花岭教会。教会人员率领信义医院医生若干赶到，紧张的站在江边，企望尽快捞出，实行人工呼吸抢救。可是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到晚上还没有消息。满岸的人群，怀着沉痛的心情，望着江流叹息、焦急、流泪、抽泣，深夜不愿离开。捞救人员通宵工作，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才于可石园附近捞出，可是先生已两目紧闭，脸色惨白，腹内无水，师生围着痛哭。可叹一代游泳名家，何以失险于资江这样的小河里？令人费解。据信义医院医生说：“先生来龙师上课前，曾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他莫作激烈运动。”但不知是入水后，身体发生了毛病，动作不方便呀！还是可石园潭深水冷，底部乱石林立，裂缝交错，妨碍了先生的动作呢？以一个国际友人，为我国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真是难能可贵啊！当时益阳县政府和教育局，讣告各方，于城内五马坊礼拜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后一天，桃花仑教育会及龙师、信中两校师生，又在桃花仑信义会大礼拜堂，举行了宗教送葬典礼，出殡时，送葬的有几千人，遗体安葬在桃花仑附近的教会坟山内。后来在坟山上竖了一块长1.6米、宽0.6米、厚0.2米的麻石墓碑，刻着先生的生卒年月日。又将当时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以及先生生前友好所送的挽幛、挽联等汇编起来，印发了《荣哀录》。

噩耗传至长沙，省会各界人士愕然悲叹。为了寄托哀思，曾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行追悼大会三天，花圈、挽联挂满灵堂和外操坪，还延伸到小四方塘街畔。长沙各中等以上学校和机关团体，前往祭奠的人甚多，每日悼丧的队伍从礼堂一直排到“一路吉祥”街口，一片悲戚气氛。足见夏先生生前为人深得人们的钦敬。追悼会后，为夏先生镌刻了一块纪念石碑，树立在青年会外操坪南面。

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半个世纪了，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以身殉职，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只可惜夏先生的墓地，在建袜厂时被刨平了，墓碑也作了铺路石。长沙青年会纪念夏先生的石碑，也在六十年代燎原电影院开设露天场时，被拆除废弃了。

附一：龙洲师范祭夏义可先生文

云影南来，证过客三生之梦；江流东去，泻英雄万古之愁。芳草龙洲，寻踪恍惚；桃仑春院，回首歔歔。呜呼先生！来从海国，久客名山，与物为春，学天行健。本体育之大师，为诸生所共仰，无河伯望洋之叹；有曾哲浴沂之情。爱南国风光，可歌可咏；与中川波媚，载沉载浮。以昂藏七尺之躯，兼锻炼卅年之力，固已空世界三千，吞云梦八九矣。宜料灾逢无妄，曲谱长离。万里云天，空思故国；一衣带水，忽了今生。竟成可石之奇缘，未免怀沙之遗憾。狂非谪仙，而几疑捉月；别犹南浦，而空望逝波。斯时也，客星夜寒，潭影谁鉴；残月晓落，人声尚喧。一则有凶灭顶，不能鱼腹长埋；一则拯溺同心，岂待龙舟竞渡。方将为文而乞哀于罔象，酹酒而求助于湘灵；然鳌钩频投，鸱夷忽出，面尚如生，目则长瞑。呜呼先生！戏海飞仙，非御石之精卫；滨河智叟，岂抱桥之尾生。而乃老呵壁之乡，谁为天问；谱箜篌之怨，将奈公何。坎象险而儿嬉；华发生而壮径。手乏划波之扇；腰无免厄之刀。可人可人，病夫久惭中国；有客有客，彼美应念西方。虽有不灭之灵魂，自动无穹之哀感。某等或共谈天，或方学海，鸿泥印在，驹谷音沉。化鹤语以何年，泣蛟珠于此日。怆然回顾，酹厥一觞，聊藉濡毫，略抒蓄意。神犹想象，天风汝唾之时；魂兮归来，夜月烟波之处。（曾宗鲁撰）

附二：周之颐先生挽夏义可联

楚天羁旅，玄塞怀人，幽恨托微波，北海南溟三万里；

可石探珠，名山瘞骨，伤心留胜迹，桃花潭水两千秋。

老而弥坚的体坛耆宿

——记袁浚教授六十年体育生涯中的片断

朱 茂 松

1901年袁浚同志出生在洞庭湖上的一个船工家庭。少年时代随父乘风破浪，学习驾船。经过自己努力，十三岁才开始上学。凭他的刻苦学习，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并取得了教育学士学位。之后，他任教于湖南的湖滨大学和苏洲、杭州等地的中学和体专。1929年，就任浙江省体育协会主席。1932年他毕业于德国柏林国立体育大学前期，同时考取为德国国家游泳联合会和救生协会会员。回国后，他以振兴国民体育事业，提高国民体质为己任。1937年，袁浚同志被聘为体育教授。1944年获得当年全国最高学术会议审查合格的教授证书。他担任过四川省立体专校长，武大、湖大、中山大学和华南师大的体育教授。在教学上多所建树。为培养提高学生的体质和开展学校体育活动，进行了创造性劳动，获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他在武大任教时就改变了该校上体育课的风气，于1936年受到教育部的通报表彰。通报中指出武大的体育活动，可与清华、南开鼎足而三。而在1936年以前，却是只有清华、南开两校被肯定的（这个事实，已被收入武大编写的校史）。三十年代初期，女生学习游泳是被禁止的。袁教授敢于冲破阻力，在李四光夫人极力支持下，终于在武汉大学校委会上讨论通过，从1933年下期开始，规定游泳达标为男女生毕业必不可少的体育成绩。爱国将领东北司令张学良，是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也是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

导者。这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以武汉行辕主任的身分，经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介绍，于1933年特意拜访了袁教授，请教和学习游泳。连续四天，在当时湖北省主席张群和行辕参谋长钱大钧等的陪同下，经袁教授指点，张少帅愉快地学习了蛙泳、仰泳，一时传为美谈。1984年7月14日《体育周报》还撰写了专文，介绍了张将军热心于体育，专程拜访袁教授这回事。

抗战爆发后，袁教授被湖南大学聘请为体育教授兼主任。过去湖大是上不成体育课的，大概是教育部通报表彰袁教授的事实为湖大师生所知，先声夺人，这里的学生对袁教授普遍都有很好的印象。加上袁教授以主任身分，亲自带领任课教师为各系各年级上好第一节体育课，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了解；再辅之以严格的达标考试和考勤制度，学生对待体育课就不再马虎了。

袁教授在回顾这一段教学生活时说：“靠以身作则，靠严格的制度，还要有提高学生认识和培养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与措施，养成学生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习惯，才能增进学生健康”。他根据湖大所在地的特点，结合爬山、跑马路，在水陆洲河中游泳，在沙滩上跑步、掷手榴弹和摔跤等项目，确定达标准则，大大改变了湖大体育学风。当时都在左家珑的省立高级农科学学校的体育老师十分赞叹：“过去湖大的体育课上不成，袁，某来任体育主任后，不管是早上或课外活

也不管有没有体育老师在场，学生都能自觉的参加体育活动了。”

1949年袁教授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解放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全国游泳协会委员。他曾经参加过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出席过国庆十周年和十五周年的国宴观礼。1982年他以81岁高龄，仍担任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组织委员。以学校体育科研会代表、交流会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大会。

六十年的体育生涯，他以自己高深的造诣，在全国体育界享有盛誉。

他的著作有杭州集益书局1928年出版的《田径规程》、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游泳》、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他翻译的德国《游泳力学分析》。

人民不会忘记，帝国主义者曾经污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袁教授在谈到这一点时，十分沉痛和愤慨。他说：“我在大学毕业后，就是想去掉‘东亚病夫’这个耻辱。加上当时军阀争夺，民不聊生，我深感要强，首先要强民，要强民就要靠体育。”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袁教授是出于爱国之心，从体育救国的观点出发，爱上了体育这个专业的。在黑暗的旧中国，一个出身船工之家又入学甚迟的青年，能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中闯出一条道路，其中包含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苦磨炼，流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经受了多少严酷的考验呵！人们何曾知道，袁教授留学德国的经费全是自己筹措的。那时他已教学有年，略有积蓄，他的朋友程登科及其亲戚给他的经济支援和帮助更大。他的整个留学生活，是在节衣缩食中度过的。到学成回国，已是当时社会上极其羡慕和崇拜的“留洋生”了。然而他却是坐的四等舱，穿过地中海横渡印度洋，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怀抱。

青年时代的袁教授生活上如此艰苦，学习方面呢？1984年5月5日，《南京日报》社

出版的《周末》，以《难忘的一鞭》为题，介绍了这样一回事：在德国留学时的袁教授第一次练习游泳，由于不能坚持游完规定时间而挨了教练一鞭。这一鞭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痛下决心刻苦锻炼。他想：“这一鞭是对中国人的鄙视！我就是累死也要顶住。”因为这个训练班就只他一个中国人，能丢中国人的丑吗？不能！有一次因运动量过大，他昏倒在游泳池里，救醒以后还是坚持不懈。一年后，他报名参加德国游泳界两个权威组织——国家游泳联合会和游泳救生会，使教练和同学大为震惊。考试结果，袁教授跻身前十名，成为两会的会员。至今讲来，袁教授还不胜感慨地介绍了当时的一个感人场景。他说：“我考上了‘两会’，那个打了我一鞭的总教练，召集了全班的同学（都是德国人），把我从队列中叫出来，当着大家的面说：‘中国人有志气’，并给我吹嘘了一番。当时我想，我不能给祖国丢脸，只有用行动来证明，中国人是有作为的，中华民族是有才干的民族。”

在旧中国，一个体育工作者不管怀有多么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心，强民之意，要真能取得成效，却是不容易的。袁教授说：“在旧社会我干体育工作三十年，我国运动员要参加一次国际体育竞赛，都是困难重重。现在经常看到中华健儿在国际体坛上大显身手，我国国旗在国际体育竞赛场中冉冉上升，庄严的国歌乐曲高奏，真叫人感慨万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但使我这个老头焕发了青春，而且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正如毛主席1949年预言那样：‘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现在我国体育健儿，正以她崭新的面貌成为了国际体坛上一支劲旅，成为了体育列强必须认真对付的对象。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飞跃！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在我有生之年，

下接38页

秋瑾女侠在湘习武

万 天 石

幼年很聪慧 习文兼习武

鉴湖女侠秋瑾，号竞雄。原籍浙江绍兴。清朝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出生在福建厦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秋瑾的祖父叫秋嘉禾，在福建厦门做同知（官职），故将全家人都带到福建厦门去了，在那儿寄居。秋瑾的父亲叫秋信侯，也跟着到了福建厦门。不久就生了个女儿，取名秋瑾。因为秋瑾自小聪慧，故视同掌上明珠。

清朝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秋瑾还只十七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秋信侯，发表为湖南常德府厘金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局斗）。秋瑾便随着她的父母来到了湖南常德。不久，秋信侯又调到湖南省湘乡县担任督销总办。秋瑾又跟着她的父母转徙来到湘乡县城。

秋瑾生长在世代书香的家庭里，加之她的母亲单氏，也是一个才女，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秋瑾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十岁时就能作文写诗，显露出才华横溢。

有一次，她随母亲单氏回到浙江肖山外婆家探亲。发现她的舅舅和表兄每天都在练习武术，因而对武术发生了兴趣，便跟着舅舅和表兄练起武术来了。起初练基本功——站桩。当她试站骑马桩时，几分钟后即大汗淋漓，浑身酸痛。可是她仍咬紧牙关，毫不叫苦，继续坚持锻炼。舅舅和表兄认为她很有毅力，遂将所有拳技、器械及马术，全都

教给她了。秋瑾如饥似渴地苦练，就这样，后来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能文善武的巾帼英雄。

秋瑾既学过少林拳，也学过武当拳。但她最喜欢的是舞剑。她的卧室里面经常挂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青霜宝剑。每天清晨或者是黄昏时候，她总得舞几路剑，或者打几路拳，用来锻炼体魄。

生儿又育女 仍学巫家拳

秋瑾的父亲秋信侯，调到湖南湘乡县担任督销总办（主要是办盐务）的第二年。经过湘乡县绅的介绍，将秋瑾嫁给王黻承的儿子王廷钧为妻。那时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与秋瑾的性格自不相同。由于受当时封建礼教的束缚，无可抗拒，只得与王廷钧共同生活。结婚时她才十九岁。

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秋瑾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王沅德。后两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王灿芝，乳名桂芳。天生丽质，逗人喜爱。

秋瑾丈夫王廷钧的父亲王黻承，外号明二胖子，过去是卖豆腐的，会打算盘，擅长经营。他和湘乡曾国藩是表兄弟，曾在曾家当过账房先生。曾国藩靠办团练、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打下南京之后，发了一笔大财。王黻承既是曾国藩家的账房，也就从中发了一笔不小的偏财。因此，他在汉